



故宫学的活力

The Vitality of Gugong Studies

郑欣淼

Zheng Xinmiao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21 Vol.22

故宫学刊

二〇二一年 总第二十二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故宫学的活力^{*}

The Vitality of Gugong Studies

郑欣淼

Zheng Xinmiao

内容提要：

故宫学的活力是保证故宫学持续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活力即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其自身所固有的不可遏止的蓬勃力量。如何使故宫学永葆活力、长远发展，是一个应该重视的问题：文化遗产是持续故宫学活力的基础；社会价值是彰显故宫学活力的条件；创新实践是激发故宫学活力的源泉；学术传承是延续故宫学活力的过程；开放合作是永葆故宫学活力的保证。

关键词：

故宫学 活力 创新 传承 开放合作

ABSTRACT:

The vitality of Gugong Studies is the most basic and most important condition to ensure the disciplin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vitality refers to the exuberant liveliness, which is its intrinsic thriving force. How to maintain the vitalit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Gugong Studies deserves close attention – 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basis for continuous vitality of the Gugong Studies; social value is the condition for its manifestation; innovative practice is the source of its motivation; academic inheritance is the process of its continuance; and openness and collaboration guarantee its eternal vigor.

KEYWORDS:

Gugong Studies, vitality, innovation, inheritance, openness and collaboration

* 本文为作者提供给故宫博物院 2018 年 10 月举办的“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故宫学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学术研讨会文章。

故宫学从提出到今天，已走过十五年的发展历程，逐渐为学术界、文化界所关注、认同并积极参与，出现了大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广泛影响，故宫学也日益呈现出自身的活力。

故宫学的活力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这些年的实践看，故宫学的活力是保证故宫学持续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活力即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其自身所固有的不可遏止的蓬勃力量；当然活力也需要激活，需要创造一定的条件促其成长；活力需要“合力”，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可促使活力发挥得更充分、更有力；而如何使故宫学永葆活力、长远发展，更是应该重视的问题。

一 文化遗产是持续故宫学活力的基础

故宫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故宫遗产——故宫（紫禁城）、故宫文物以及遗产的守护者与传承者——故宫博物院。

故宫虽然是明清时代的皇宫，但它是中国历代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的最高典范，蕴藏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它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后期发展，特别是礼制文化和宫廷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见证。在建筑群体布局、空间序列设计上，它传承和凝练了轴线布局、中心对称、前朝后寝等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宫城建设传统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制度的典范。其宫殿建筑技术与艺术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的最高成就。

故宫博物院现有文物藏品186万件多，其中85%以上为清宫旧藏。这些珍贵的皇家藏品、皇家生活用具以及大量古代工程技术的文字、图纸、烫样等档案载体，见证了中国明清时期的宫廷文化和典章制度。故宫是世界上最丰富、最重要的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宝库。这些收藏无比丰富精美，具有品级上、品类上、数量上的优势。论时代，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宋元明清；论范围，囊括了古代中国各个地域的文明精华，包容了汉族和古代许多少数民族的艺术精粹；论类别，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品的所有门类。故宫是一部浓缩的中华5000年文明史。

故宫古建筑与文物藏品又是密切联系的。皇权的至高无上，皇家文化的“大传统”性质，宫廷收藏品的无与伦比及其政治意义，都使故宫及其藏品具有唯一性或经典性的特征。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道，故宫及其皇家收藏凝聚了传统的特别是辉煌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几千年中国的器用典章、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以及学术、艺术等积累的结晶，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之一，就像金字塔之于古埃及、雅典卫城神庙之于古希腊一样。

成立于1925年10月10日的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和宫廷旧藏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宫殿建筑群、古代艺术品及宫廷文化史迹为主要展示内容的大型综合性国家级博物馆。“宫”与“院”的合一，是故宫博物院与生俱来的身份，北京故宫博物院因此成为一座同时兼具宫廷史迹、古代建筑、古代艺术和清宫藏书档案几大特性的博物馆，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文化博物馆等特色且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院和文化遗产。

由此可见，故宫遗产的内涵十分丰富，真正具有深不可测、横无涯涘与独一无二的特点，是持续故宫学

活力的基础。

二 社会价值是彰显故宫学活力的条件

故宫的价值就是故宫学的价值。故宫不只是“国宝”“精品”的荟萃之所，其一砖一瓦、一物一件都有其价值与生命。故宫学的学术价值是由其研究对象的博大精深所决定的，是由故宫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故宫的最重要价值是宫廷历史文化内涵。故宫学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从已发布的研究成果看，许多都是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中国明清史的重大课题。故宫学又包括紫禁城学、明清宫廷史学、明清档案学以及中国古代书画、工艺、金石等古典艺术学。清代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总结性，即集传统之大成的潮流。故宫学重要而独特的学术价值，还与其研究对象——故宫建筑与故宫文物所具有的集大成性特点有关。

故宫是有生命的，它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息息相关，与当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休戚与共。故宫学任重而道远。

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政党或集团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和对推进文化发展、发挥文化效能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对文化价值的觉悟觉醒。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及充分肯定。文化是一种基因和血脉，一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文化自信一旦树立起来，其影响将更深远。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文化自信，最主要的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价值支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正是来源于它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它的源远流长和独特魅力。它是华夏民族文化的重要革新之源。故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重要载体之一。

对故宫的认识，就是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是对我们民族的文化的认识。封建专制时代随历史潮流结束了，但故宫仍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象征意义。它代表了中国的过去，新的政权就是在这个历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们只有在扬弃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新的文化。同时皇宫成为故宫博物院，使象征皇权统治继承性、合法性的清宫旧藏成为人民共有共享的文化财产，并赋予而且不断强化着其民族文化血脉的新意义，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作用。这些珍藏在抗战期间避寇南迁，与中华民族同命运，成为民族文化命脉的象征。故宫又是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海内外了解中华历史文化的窗口。

随着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高速发展，人们更重视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倡导文化的复兴，寻求本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故宫作为传统文化重要载体，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人们对故宫寄予新的期望，因此对故宫的意义与价值也需要充分的、新的阐释，以发挥故宫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扩大中华文明影响力与进行文明对话等方面的独特作用。这是故宫特殊身份所决定的，是时代的要求，也正是故宫学的历史使命。

三 创新实践是激发故宫学活力的源泉

负有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故宫和发展博物院事业的责任的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各项工作稳步健康发展，在不断探索中实践，特别是能够与时俱进，坚持创新性思维与创造性工作，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体现了作为中国文化遗产守护者与传承者的视野、魄力与担当。而故宫学是以文物（可移动的文物藏品与不可移动的古建筑）作为研究对象，即与古建筑保护与文物的收藏、保护、展示不可分割，带有学理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特点。因此故宫博物院的发展与故宫学研究紧密联系，互为促进；或者说，故宫博物院的创新实践是激发故宫学活力的源头活水。

（一）领域的拓展

1. 故宫北院区

在国家的支持下，故宫从2012年实施“平安故宫”工程，其中一个重大项目是故宫北院区的建设。故宫在海淀区西玉河原有80亩的基地，并建有8000平方米的培训中心。2013年5月，有关方面已同意在原西玉河基地周围，为故宫北院建设规划出一块16公顷的项目用地，用于故宫文物藏品修复、故宫文物展示、数字故宫文化传播、故宫文化产品研发、文物博物馆专业人员培训、宫廷园艺研究展示和社区公众服务等多项文化功能。建筑面积约12.5万平方米。这个项目的建设，将使故宫保护与故宫博物院发展迈入一个新阶段。2018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正式启动。

2. 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

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由厦门市政府与故宫博物院合作建设，是故宫博物院在地方设立的第一个主题分馆，集中展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两代的外国文物。2017年5月13日开馆。

3.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位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西九文化区西部海滨，它将以固定地点、定期更换展品的形式，对故宫博物院赴中国香港的展览进行规范化和系统化的提升，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数字多媒体展示、故宫知识讲堂、文化创意产品营销等，创建一个独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故宫综合展示空间。2017年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香港见证了《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2018年5月28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中国香港西九文化区举行奠基仪式，标志着博物馆的建设工程将陆续展开。

以上这些，都具有开创意义，也都为故宫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新的要求。

（二）思维的创新

1. 提倡研究性保护

在古建修缮保护方面提出了“研究性保护项目”的概念，即突出维修工程中的科学性，加强学术研究，力求使维修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方面都能有科学的依据，都是扎实可行的。2015年12月启动了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的前期工作。鉴于养心殿地位重要、影响巨大以及文物建筑复杂的特点，“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

课题”设置了35个分课题，涉及与养心殿工程有关的清宫历史文化、文物陈设、文物保护（包括防震）、古建筑技艺以及工程管理等，基本上包括了维修工程的各个方面，参与的有院内7个部门，参加课题的研究人员共234人次，2018年9月完成了这一系列研究任务，养心殿维修工程才正式开工。这一课题提供了故宫保护工作与故宫学术研究相互结合的一个范例。大高玄殿研究性保护项目以故宫博物院为核心，多家高校、科研机构考古文博研究人员共同协作的研究团队，同时，引进考古学的理念，运用以人为主导、数字手段为辅的建筑考古及历史信息记录方法，保证大高玄殿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2. 推动多学科合作

在多学科合作中，实行“科研项目制”。“科研项目制”为研究院推动学术研究工作的基本模式，一切学术组织与实施均以“科研项目制”为依归，研究院下属各机构的学术工作和活动均指向实实在在的学术项目，设备配备、人员配置、工作推进、方法探索均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国家级、省部级和院级项目上，使启动的项目阶段明朗、成果可期。观念的突破、机制的创新，为“科研项目制”运作模式带来了勃勃生机。故宫研究院的学术研究，是博物馆做学术研究的典型例证，其“科研项目制”与教学相长的高校系统有差。故宫的学术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有着比较强的实用要求，很多课题是为解决工作中遇到难题而开展的。

3. 注重行业内影响

以文博培训教育及传播故宫文化为宗旨的故宫学院，从2013年成立以来，面向故宫博物院自身、文博行业以及社会和国际持续开展培训教育工作，面向院内员工举办满文高级培训班，承办原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地方市级文物局等单位委托的培训班若干，学员近200人，在为国内文物博物馆界加快培养专业人才和新型管理人才方面成绩出色。故宫学院也在景德镇、西安、深圳等七地成立分院，“故宫讲坛”也随之落户七地，加上北京、苏州，“故宫讲坛”目前已面向公众举办130余场讲座，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三）文化的创新

提出故宫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更好地普及故宫知识。现在清宫戏很多，在“戏说”之风盛行的情况下，故宫有责任也完全能够向人们提供准确的、活生生的有关场所、实物，有助于人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同时，故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不是简单的旅游胜地。要让每一个普通观众的故宫之旅成为一次难忘的文化朝圣，要使观众从一般“游览”的心态转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景仰，得到熏陶、启迪，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故宫知识的普及，需要给观众一个有关故宫的总体知识。

故宫博物院在传播故宫文化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博物馆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主要方式是陈列展览。故宫博物院把不断提升展览质量作为一个永恒的课题来抓，讲好故宫文物的故事，传播故宫文化。2013年以来，随着开放区域不断扩大，展示空间的增加，展览数量与质量也在提升。2015年，适逢故宫博物院90年院庆，宝蕴楼、慈宁宫—寿康宫区域、午门—雁翅楼区域、东华门区域等四大区域对外开放，“普天同庆——清代万寿盛典展”“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等18项展览陆续开幕，雕塑馆、古建筑馆、数字馆等一系列专馆开放。其中“石渠宝笈特展”共吸引约17万名观众争相观展，出现了观众争相竞跑的“故宫跑”现象，武英门外观展队伍蜿蜒数百米。2017年，“千里江

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再次成为文化热门话题。近年来又引进了一些外国文物展。

故宫博物院在故宫文化传播中，追赶时代潮流，善于运用数字新媒体技术。故宫新媒体团队着力研究受众群体的变化，更新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通过更新官方网站、发送官方微博、开通微信公众号、营销文化创意产品等灵活的线上线下互动方式，准确把握青年人的接受兴趣和关注特点，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以富有内涵且饶有趣味的形式推广传播，在年轻网民中积聚了大量人气，成为中华文明网络传播的成功实践。例如“数字故宫社区”中的“数字故宫”在线项目，就包括全景故宫、故宫出品系列APP，以及数字展厅的关联、分享与互动，展示故宫博物院在古建筑修缮、藏品保护、观众服务、科学研究、文化传播等各个方面的最新进展、最新成果。截至2017年，故宫官方微博粉丝总量达767万人，官方微信粉丝量为53万人。“爱上这座城”话题阅读量突破9亿，成为新浪微博账号最受欢迎的话题。端门数字展馆从2015年12月开放以来，一直受到观众的欢迎。

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意产品也成为传播故宫文化的一种形式，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公众的关注和喜爱。目前故宫累计研发文化创意产品超过一万种，获得相关领域奖项数十种，形成了多元化的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系列。故宫发展文化创意产品的宗旨是让文物的故事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人心，走进人们文化生活。许多故宫文化产品，在注重历史性、知识性、艺术性的同时，又强调创意性及功能性，增加了趣味性、实用性、互动性。“朝珠耳机”“朕亦甚想你折扇”“故宫猫”等风趣幽默的文化创意产品，通过观众期望与文化创意产品升级的互动，使人们真实感受和充分理解故宫博物院所传递的文化信息。

我们高兴地看到，通过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的努力，故宫文化得到大力传播，故宫的良好形象得以树立，社会更加关注故宫。人们发现，原来故宫与他们的生活也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故宫离他们越来越近了，因此对故宫产生了一种亲近感。故宫的举措经常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在故宫博物院的文化传播中，故宫学研究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而社会对于故宫文化的关注、重视就像深厚的沃土，成为保持故宫学活力的难得的基础。

四 学术传承是延续故宫学活力的过程

故宫学作为学术概念是2003年才提出来的，但是它的萌蘖则始自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尔后随着以故宫博物院为主体的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为这门学科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故宫学术形成了一个好传统，即注重文化积累与传承，这与故宫文物的特点有关系。

故宫博物院一开始就定位于一个学术机构。20世纪30年代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文物的审查、鉴别、整理。清宫变为博物馆，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对浩如烟海的清宫物品进行整理审查，鉴别真伪，即科学地鉴定，这是硬功夫，也是博物馆工作的基本要求。把故宫的这些工作列入学术范畴，这是一个突破，也是对学术本质的深刻认识。因此，故宫学术研究的成果除学术论著外，还有大量的成果与业务工作结合在一起。故宫专门委员会后来细分为9个专业委员会，其中一个“建筑物保存”。这说明对故宫学术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入。

专门委员会时期积累的从故宫实际出发的学术研究的特点和方法，后来得到传承发展。90年来，故宫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从最初的文物点查、整理、刊布逐步转向文物保管、研究与展示等方面，再逐步转向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综合方面，并且在研究过程中逐渐自成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故宫学派”。所谓“故宫学派”，即故宫博物院的研究者在进行故宫学学科理论建设和文物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特色的学术流派，其共性是要求研究者从具体文物入手，以相关的文献档案为依据，利用、借鉴有关研究方法，坚持史与物的结合，力戒空论。如徐邦达等先生在书画研究上创立的“鉴定学派”，陈万里、冯先铭等先生在古陶瓷研究上创建的“窑址调查派”，单士元等先生开辟的“宫廷建筑派”等。当然，由于各个分支学科条件、机遇等综合因素的差异，有的还处在起步阶段。

在研究方法上，故宫学术重视多重论据法。考证一直是故宫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借助于文物藏品及历史文献，以物证史，或以史论物，史物结合。史学研究的一项任务就是“复原”历史，确切地说，是“复原”接近真实的历史。为此学术界曾提出“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等研究方法，以推动史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故宫不仅拥有保存完整的明清宫殿建筑遗址，还保存有大量珍贵的文物藏品以及档案典籍，甚至还保留有“师徒传承”的传统工艺技术。因此，故宫研究的证据可谓是多重的、立体的。这也是故宫学生存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它可以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充分发挥多重证据的优势，以“复原”丰富的、多面的、立体的历史与文化，从而形成独具一格的多重论据法。

故宫学的传承性，还在于故宫研究的许多项目，是要下气力的，是要多人的合作，而且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有的甚至需要数代人的接力奋斗。已坚持了近70年的古代窑址调查就是一例。这是陈万里先生开创的一项事业，形成了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的一项特长。陈万里1946年撰著的《瓷器与浙江》，开古代窑址调查之先河。1950年他带领故宫人员遍访我国南北各地调查窑址，特别是对北方瓷窑最为集中的河南、河北两省进行了调查，发表了多篇调查报告与重要论文，也培养了人才，冯先铭、叶喆民、李辉柄、李智宴等先生就是从这系列的调查工作中逐步成长并成为著名学者的。窑址调查工作已持续至今，并整理出版了《故宫藏传世瓷器真贋对比历代古窑址标本图录》（1998年）、《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河南》（2006年）、《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河北》（2006年）、《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北京、山东、陕西、宁夏、辽宁》（2013年）、《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山西、甘肃、内蒙古》（2013年）等，已成为研究者认知古代各地窑址产品特征的重要参考文献。

故宫学术的这一传统，在21世纪初陆续成立的古陶瓷研究中心、古书画研究中心、古建筑保护研究中心、明清宫廷史研究中心、藏传佛教文物研究中心的学术活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故宫研究院成立后继续发扬。故宫学的这种传承性，是学术发展过程的反映，也是其自身活力积累的过程。这种积累过程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2013年故宫博物院建立了体制创新、机制灵活、学术民主的故宫研究院，以大布局大整合大开放的发展理念，着力规划故宫学术新布局。

截至2018年9月，故宫研究院下设1室20所，即研究室及故宫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明清宫廷历史档案研究所、古建筑研究所、宫廷戏曲研究所、明清宫廷制作技艺研究所、文博法治研究所、书画研究所、陶瓷研究所、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中国画法研究所、宫廷园艺研究所、

中国书法研究所、钟表研究所、宫廷原状陈列研究所、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世界文明古国研究所、影视研究所，在故宫博物院初步形成覆盖全面、专业突出和梯次完备的学术团队。其中研究室、故宫学研究所为建制单位，其他19个研究所都是非建制单位。

成立非建制的大型研究机构，是博物馆发展史上的先例。它发展了行政管理体制的固有模式，赋予故宫研究院以规划、组织、评估、发布等基本学术管理职能。非建制的故宫研究院在组织机制方面显露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一是统合全院的学术研究活动，制订具有全局性的顶层发展规划，并按规划组织实施，各所以“科研项目制”为基本运作模式，同时积极争取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科研课题项目。二是以学术研究为引领，聚拢、吸纳各方面的学术研究人才，充分发挥业务人员的学术专长，聘用的专家岗位明确、任务明晰、权责明了，从而保证各项目顺利进行。三是非建制学术机构的性质更便于与关心故宫的企业和知名人士建立联系，争取社会各界捐助资金和资料、设备等，赢得社会各界对故宫学术的广泛支持。

故宫研究院成立以来，以其开放的学术胸襟、创新的机制接纳国内外学术界热心于故宫学术研究的人才，且与院内的专家学者共同构建高端学术研究平台，已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故宫学迸发活力并可持续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故宫学的美好前景、持续活力在于学术的薪火相传，在于一批批研究人员的沉潜努力。在学术人才的培养上，故宫学十分重视高校的作用。多年来，故宫博物院先后与中国艺术研究院联合培养硕、博士研究生，协助浙江大学成立故宫学研究中心，与南开大学合作成立故宫学与明清宫廷研究中心并招收博士研究生，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东北师范大学等院校招收故宫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与北京工业大学在文物保护科技方面进行合作等。例如，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物与博物馆硕士教育中心合作，从2012年到2017年共招收了六届故宫学专业研究生50名。

目前与故宫博物院合作的高等院校大都有着先进的教育理念、雄厚的教育资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优良的学术氛围，而且在学科设置和发展上各具特色，优势突出，并形成各自优良的学术传统。与高校的合作将极大地发挥故宫博物院和高等院校在学术资源和学术人才方面的优势互补作用。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将得到强大的理论支持和学术后盾，高等院校也将完善自身的学科建设和与社会的沟通，尤其是故宫学作为学术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方向被纳入研究生教育体系，这对于故宫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自2012年起，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每年举办一届故宫学高校教师讲习班。学员来自国内各高校。为期两周的讲习班课程以专题授课、参观考察和交流讨论的形式展开。讲习班的开办推进了故宫博物院与高校教师之间的学术联系，也加深了高校教师对故宫博物院的深入了解，从而进一步拓展了故宫学联合高校的学科发展思路。高校教师讲习班至2018年已连续举办了七届，共招收100所国内外高校的160位教师。

故宫学进课堂也有很大进展。一些高校开设了“故宫学”通识课，如北京工业大学、深圳大学等；上海大学则开设了“紫禁城”课；清华大学教学委员会已讨论通过了“故宫学”的课程设置，2019年第二学期开始为清华本科生开课。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2009年秋季就开设“故宫学概论”选修课程，给予学生正式学分。“故宫学”进大学课程在故宫学的发展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令人鼓舞的，是故宫学通过智慧树网进入677个大学的消息。“智慧树”是在上海注册的一家网络公司，其主要目标是帮助各类学校、教育机构发布教

育信息，实现教学业务的在线服务。2017年，故宫研究院与中国紫禁城学会合作制作了《走进故宫》课件，由12位专家就故宫价值与意义、故宫建筑、故宫文物（包括收藏史、书画、青铜、瓷器、外国文物、藏传佛教、清宫档案、故宫藏书）、故宫博物院史、故宫文物保护与工匠精神等分别授课。据智慧树公司介绍，截至2018年7月15日，《走进故宫》课程选课学校共677所，获得课程学分的学生198314人，学生的满意度达到96.3%，这在线上课程中是比较少见的。这些接受了故宫学教育的学生，相信会通过了解故宫进而热爱故宫，甚至以后研究故宫，成为故宫学的后备队伍。

五 开放合作是永葆故宫学活力的保证

1929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周年，作为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与理事长，李煜瀛先生有个讲演，回答了如何使故宫博物院成为一个“完全美满”的文化机构的社会期望。他指出清故宫须成为活故宫，活故宫的精神在于坚持一个“公”字¹。这种“公”，即公开、公共、开放，面向公众，社会参与。只有具备这种精神，才能使它不负众望，永葆其生机与活力。故宫学研究同样需要开放合作的精神。

故宫博物院十分重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交流与合作。海峡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同根同源，其藏品都以清宫旧藏为主，1925年至1948年，又为两个博物院的共同院史。这种血脉相连的渊源，决定了两个博物院之间有着难以割断的关系。故宫学则是联结“一个故宫”和“两个博物院”的纽带，也是两个博物院交流合作的内在动力。2009年，两岸故宫博物院在分隔60年后再聚首，迈开了交流合作的步伐。2010年6月，两岸故宫开展了“温故知新：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的活动，以“重走”的方式共同回顾这段不寻常的历史，追寻先辈足迹，让个人记忆变成集体记忆、民族记忆。

学术为天下公器。故宫学一直倡导“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中国、在世界”的学术理念。故宫学不只是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或是海内外收藏有关清宫文物的机构或个人的事，而应该是海内外学术界的共同事业。事实上，故宫博物院也难以完全承担这一任务，需要社会上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只有国内外研究力量广泛参与，交流合作，取长补短，才能进一步激发学术研究的活力，取得更大的成果，也才能使故宫学真正发展成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因此，故宫学是推进故宫学术交流、科研互助、资源共享的有力举措。

开放性视野有利于加强清宫流散文物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从近代以来，清宫中的不少书画、陶瓷、青铜器、典籍、档案等流散到海内外一些机构或个人手中。清宫文物在海内外的大量散佚，客观上也为更多的机构与个人参与故宫学研究提供了条件。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清宫旧藏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的文化精神是故宫学的一部分，故宫学是其学术上的归宿。海内外的广泛参与，把故宫的文物包括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文物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将会进一步挖掘故宫的丰富内涵，认识故宫的完整价值。

多年来，故宫博物院全力拓展与国内外知名博物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其他学术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开展文物保护项目和科研课题项目、合办学术会议、合办学术刊物、联合

¹ 《清故宫须为活故宫》，载《李石曾先生文集》下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辑出版，1980年5月，第241—242页。

办学等，在数字故宫和信息技术方面、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陶瓷考古发掘和藏传佛教艺术研究和保护方面以及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最近几年，故宫博物院在对外开放合作中有不少举措，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举办“太和·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坛”，努力为世界古代文明保护与传承做贡献。故宫博物院对于保护与传承古老文明有着一份强烈的责任感、一种宽广的胸怀、一个美好的梦想。从2016至2018年，故宫博物院连续成功主办了三届“太和·世界古代文明保护论坛”。首届论坛代表有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中华文明、波斯文明和玛雅文明8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外交人员。后来两届又拓展了文明古国的范围，扩大到20个左右，还邀请了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这三个国际组织的专家与会，旨在研究和探讨在当今国际环境下，世界文明古国文化遗产在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促进文化遗产领域同人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世界古代文明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持久作用。会议取得丰硕的成果。

作为太和论坛的倡导者、组织者，故宫博物院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有目共睹的实效，赢得国际社会的敬重。2017年9月30日，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回顾了召开论坛的初衷，介绍了2016年论坛取得的重要成果——《太和宣言》。他说：“《太和宣言》以中国哲学追求的完美境界‘太和’为名，倡导文明古国相互尊重，彼此聚合，以构建和谐的世界为目标，通过举办文化发展论坛，举办文物交流展览，举办学术研讨会及其他相关活动，形成传播古国文明的深刻诠释，唤起跨越文明的对话和跨越民族的认同。”

一个博物馆举办如此主题、规模的国际会议，且要坚持下来形成制度，确实是个大手笔。对故宫学来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太和”为核心的“和”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研究世界古老文明的保护与传承，又是一个重要课题。

以上种种，决定了故宫学持续而充沛的活力！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